

# The Disenchantment of War and the Becoming of War Machine i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sup>1,2</sup>ZHANG Qiumei

<sup>1</sup>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ne 21, 2024

Accepted: July 20,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Qiumei. (2024). The Disenchantment of War and the Becoming of War Machine i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094–10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11>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The Disenchantment of War and the Becoming of War Machine i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is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Project Number: 19YJC752041), China.*

**Abstract:** Stephen Crane’s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is a classical war novel, in which the cruelty of war and the insignificance and vulnerability of the human are vividly and meticulously depicted. Theoretically based on Deleuzian concepts of “war machine” and “becoming”, this essay, while tracing Henry Fleming’s fighting courses, i. e., joining the army, fighting in the war, escaping from the battlefield, and going back to the front, purports to uncover the enchanting mechanism of media and other cultural icons and interpret the becoming process of “war machine”. This dynamic process, on Deleuzian account, is a kind of life event, a question, an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the war, which is also a mirror of Stephen Crane’s disenchantment and subversion of military heroes and legendary warfare.

**Keywords:** war machine; badge; affect; becoming; event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ANG Qiume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 lecturer a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drama studies, as well 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 論《紅色英勇勳章》中戰爭的祛魅與戰爭機器的生成

<sup>1,2</sup>張秋梅

<sup>1</sup>南京大學；<sup>2</sup>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摘要：**斯蒂芬·克萊恩的《紅色英勇勳章》是一部經典的戰爭小說。克萊恩用生動形象的語言細緻入微地刻畫了戰爭的殘酷以及人類的渺小與懦弱。本文借用德勒茲的戰爭機器和生成概念，以弗萊明從參軍、參戰、逃逸、到最後回歸戰場的戰鬥歷程為線索，揭示媒體、文學作品和勳章等文化符號的造魅機制，闡釋「戰鬥英雄」弗萊明作為戰爭機器的生成過程；本文指出這種不斷變化的能動性的生成是一種生命事件，是對戰爭規訓權力的質疑和抵抗，也反映出克萊恩對「荷馬傳奇」式的戰爭思想的顛覆和祛魅。

**關鍵詞：**戰爭機器；勳章；情動；生成；事件

**基金項目：**中國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項目編號：19YJC752041）

## 一、引言

《紅色英勇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1895）是美國作家斯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的代表作，小說以美國南北戰爭為歷史背景，描述了弗萊明在戰爭中從懦夫成長為勇士的歷程。作為一位自然主義先驅，克萊恩在這部小說中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述了戰爭的殘酷和血腥，並用細緻入微的心理描寫展現了主人公弗萊明善惡並存的內心世界。弗萊明一心要在戰爭中建功立業，參軍後在死亡的威脅之下從戰場上逃跑，而回到戰場後又隱瞞逃跑的真相；最終在不斷的自我拷問之下，成長為一名「不畏犧牲」的勇士。這些對戰爭場面和人性弱點的刻畫，都是克萊恩對戰爭入木三分的諷刺，是對資本主義英雄主義的一種解構和顛覆。弗萊明的戰爭歷程和成長蛻變是德勒茲戰爭機器概念的完美闡釋。

德勒茲（Gill Deleuze）的機器概念強調裝配、聯繫和生成，是一個持續的生產過程。欲望機器和戰爭機器是德勒茲哲學和美學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德勒茲指出欲望不是「缺失」而是生產<sup>①</sup>，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對欲望進行編碼其實是轄域化的過程，體現了國家機器的權力印跡。德勒茲認為游牧方式是躲避國家機器編碼和解放欲望的一種形式。而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987）一書中，德勒茲提出與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相對立的戰爭機器（war machine）的概念。國家機器指的是諸如軍隊、監獄等捕獲和轄域欲望流的權力組織，具有規訓、編碼、轄域的功能。而戰爭機器指反抗捕獲和轄域的他者，它是主體以各種形式抵制規訓和解轄域化的欲望機器。戰爭機器並非只與戰爭相關，它具有多種變式。遊牧民（nomads）是眾多戰爭機器中的典範，它的本質就是戰爭機器。為了逃避國家裝置的捕獲，遊牧民在抵抗的同時，也不斷逃逸，生成逃逸線。遊牧民就像是德勒茲概念中的「塊莖」（rhizome），在運動中對空間進行解域和轄域，同時「以平滑的方式游牧是一種生成，而且是一種艱難的，不確定的生成」<sup>②</sup>。借助德勒茲的戰爭機器和生成概念，本文沿著弗萊明從參軍、參戰、逃逸、到最後回歸戰場的戰鬥歷程，揭示媒體等文化符號對戰爭的賦魅，解構主人公所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剖析戰爭給弗萊明等戰士造成的創傷，並闡釋戰爭機器的生成過程。

## 二、戰爭與勳章的賦魅

《紅色英勇勳章》創作於 1895 年,描述的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戰爭故事。當時 19 世紀的美國文化導致全社會開始重新提倡尚武精神,騎士精神和英雄主義受到全社會的推崇。內戰時期及其後的文學作品和媒體都刻意美化愛國主義和戰士的英雄氣概。美國的生成歷史本身就帶有疆土開拓精神和英雄崇拜精神;而這個時期國內的流行小說也側重表現尚武士氣和騎士精神,這些思想深刻影響著人們對於戰爭的認識以及戰後作家們的創作。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多部小說因書中表現出的英勇果敢的男性氣概而大受歡迎;史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 1883)、《顎圖王子》(*Prince Otto*, 1885)等同時期小說也都鋪陳渲染騎士傳奇<sup>③</sup>。此外,美國作家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 Jr.)、奧利弗·奧普蒂克(Oliver Optic)等也在作品中描述了年輕人在驚心動魄的戰爭中英勇奮戰的傳奇經歷<sup>④</sup>。這些文學作品激發了克萊恩的創作欲望,克萊恩意圖挑戰這些流行故事中的尚武精神,在新的語境中重新審視戰爭。雖然他沒有親身經歷南北戰爭,但他憑著對戰爭文獻的理解和對戰爭的想象,親臨其境般地描繪了真實的戰爭場面。

《紅色英勇勳章》中主人公弗萊明也同樣深受文學作品和媒體中宣揚的戰爭傳奇的影響。弗萊明內心懷有對荷馬時代英雄的崇拜,想像能像鷹一樣保護村民,期待一場「血紅血紅,壯麗多彩」的戰爭來展示自己的英雄氣概,戴著一枚英勇勳章光榮還鄉。「他讀過行軍、包圍、兩軍交戰情景的書」,「報紙、村裡的流言蜚語、自己的想象,把小夥子激發到無法克制的程度。人家果真在那邊打得精彩,報上幾乎天天都有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報導」<sup>⑤</sup>。「接連不斷的軍事行動極大地點燃了公眾的熱情和主戰思想」<sup>⑥</sup>。在被應徵入伍後,他沉浸於同學們的羨慕和姑娘們的崇拜中,「內心膨脹著平靜的驕傲」<sup>⑦</sup>。最終弗萊明懷著對戰爭和英雄的烏托邦式幻想和他膨脹的虛榮心,毅然奔向戰場。戰爭已經成為一種建功立業的傳奇,一種所向披靡的神話。在這個戰爭神話的虛構中,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戰爭的殘酷性被它們建構的傳奇和勝利所掩蓋。傳播媒體和文學作品與宗教一樣,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其目的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克萊恩的這部小說雖然沒有特別指明美國內戰的歷史背景,但在克萊恩生活的 19 世紀後半期,美國資本主義正處於工業化和機械化的發展時期,迫切需要戰爭來解放勞動力,掃清障礙來普及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生產方式。傳媒利用廣播和出版物這些工具美化戰爭的動機和目的,向公民灌輸民族主義、英雄主義等思想,使個人臣服於這種政治的意識形態。文學作品中體現的疆土開拓等精神是資本主義上升發展時期的需要,也深刻影響著讀者的思想意識,因此媒體和文學作品都是一種文化機器,具有與意識形態機器相同的教化規訓作用。弗萊明正是在這種冒險和開拓精神的教化之下,對戰爭中的豐功偉績充滿了期待。

此外,勳章也具有致幻或造魅的力量。勳章是一枚帶有圖案的裝飾品,在中世紀盛行,成為僧侶騎士團的徽章標誌。隨著近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勳章被賦予了獎勵功勳的功能,成為一種服務於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工具。勳章被賦予了榮譽的象徵意義,構建了一種特殊的身份,繼而帶來各種特權、優待或直接的經濟利益。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勳章體制,而美國的勳章制度不注重身份地位,而以實際功勳為衡量標準,這實際上符合美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生產方式,同時也呈現了「美國夢」的造魅機制。美國內戰時期頒發的英勇勳章(Medal of Valor,後來統稱為 Medal of Honor)是最高的榮譽勳章,用於表彰戰爭中捨生忘死、英勇奮戰的戰鬥英雄。這是對騎士精神和犧牲精神的肯定,本質上是教化規訓軍人的行為以達到軍隊期望的目標。因此,人造的勳章被賦予了表意功能,也具有了符號的象徵意義和實用意義,同時也是一種意義的生產。這種符號神話具有造魅的力量,使得勳章所代表的英雄主義成為一種訴求,訴求通過積極參與政治運動,實現身份的重組和社會的認同。德勒茲指出,這種具有象徵意義的圖像符號是一種特殊的轄域化標記

象徵,它將人們聚攏起來而且會引起力量的重組與強化<sup>⑧</sup>,「背後滲透著國家權力的運行和文化實踐」<sup>⑨</sup>。弗萊明在參戰前就渴望得到一枚象徵著英勇和榮譽的勳章,成為真正的英雄,以期衣錦還鄉、榮歸故里。戰爭勳章所代表的榮譽是一種具有生產關係的符號,它代表一種欲望,被社會政治加以編碼,具有掩蓋權力壓制性的特徵,從而使弗萊明這樣的士兵自動地、心甘情願地充當權力遊戲中的一顆小卒子。因此,弗萊明在進入軍隊之前,就已經被教化規訓為一種戰爭機器了。

總之,戰爭作為一種國家機器的政治手段,在文學作品、媒體等意識形態文化機器的推波助瀾下,操縱著人們的思想意識,構建了烏托邦式的傳奇與神話,使得每個士兵都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工具。但走向戰場的弗萊明目睹了戰爭的殘酷,逐漸對戰爭的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但還是繼續履行著作為戰爭工具的使命。

### 三、戰爭的祛魅與戰爭機器

既然戰爭作為政治的手段,操縱人們的意識和行動,服務於國家機器。那麼作為戰爭工具的弗萊明,是如何打破了戰爭神話,意識到戰爭的欺騙性,又是如何戰勝和克服了內心的恐懼,履行個人使命和實現政治功能的?

戰爭的面紗隨著弗萊明的入伍征戰被徹底撕開。首先,書上希臘傳奇式的打仗方式無法應付機械化戰爭的迅猛。戰爭打響之後,弗萊明還期待敵人會道歉鞠躬退下,然而炮彈橫飛的戰爭場面擊碎了他對戰爭的浪漫想像。戰場上,他的英雄主義氣概完全被死亡的恐懼戰勝,尤其是在面對一具具士兵的屍體時,死亡的恐懼包裹了他的全身;「大炮的轟鳴聲令他戰慄,滑膛槍一陣陣參差不齊的長長尖叫折磨他的耳朵」,「槍聲炮聲攪成血淋淋的鼓噪,傷兵們從這鼓噪聲中源源流出」<sup>⑩</sup>。他覺得「兩軍混戰就是兩隻美洲豹在相互撕咬」<sup>⑪</sup>,面對機械化的戰爭,他認為「自己和夥伴們都滑稽可笑,嚴重誇大了雙方的力量,還以為自己手中操縱著戰爭的命運」<sup>⑫</sup>。弗萊明感覺部隊就像一隻移動的盒子,四面都是鐵一般無情的軍紀,逃離軍隊是絕不可能的。此時「他悟出自己從沒想參戰,參軍並非自願,是被無情的政府硬拉進來的。現在,人家又要拉他去挨宰了」<sup>⑬</sup>。此外,士兵的盲從和迷茫讓他狂躁不安;他覺得「這一切全是圈套」,「他們不該像豬獠一樣被活活宰死」<sup>⑭</sup>。但是他明白,這種思想會被嘲笑、挖苦,甚至會有被殺頭的危險,因為在森嚴的軍紀面前,這種思想無疑是懦弱和逃避,這與勇猛果敢的騎士精神背道而馳。因此,諸如弗萊明這樣的士兵們,只能接受國家機器的編碼,也就是被轄域化,履行國家機器賦予的政治使命,實現個人的「英雄主義」夢想,成為戰爭機器。

戰爭總與戰爭機器相聯繫,但戰爭機器和戰爭卻不是一回事。「戰爭機器不必把戰爭作為目標,儘管(在特定條件下)戰爭和戰鬥可能是必然結果」<sup>⑮</sup>。戰爭可以被視為一種手段,服務於國家的政治目的:「保全、紋理化、保衛並擴張國家領土」<sup>⑯</sup>,這說明戰爭服從於國家的政治目標,實質是政治的繼續。「從德里達的角度,我們可以說,戰爭是對戰爭機器的『增補』」<sup>⑰</sup>。因此,戰爭機器不過是國家機器挪用的工具與手段,而戰爭在特定時期內成為這種挪用的目標,最終是為了消滅某種國家力量和形式<sup>⑱</sup>,進行新的生產關係的重組。小說中雖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但對戰爭雙方的描述卻很模糊,或許,作者無意於戰爭雙方的對立,無論孰對孰錯、正義與否,都是國家機器的工具,最後都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摧毀和生產關係的重新整合。戰爭和媒體都成為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共謀,弗萊明這樣的士兵只不過是國家機器和政治利益的棋子,無法擺脫被規訓被吞併的命運。

弗萊明目睹了戰爭的殘酷,對戰爭的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在從戰場逃跑之後,卻又回到了戰爭中來,這是否意味著他是主動規訓或臣服於權力或者國家機器呢?答案無疑是否定的。首先逃兵會面臨嚴厲的軍事懲罰,這種懲罰正是國家機器的權力規訓實踐;其次,戰爭的規訓使得任何參與者都無法逃脫奴役和服

從。「當人類本身成為機器的組成部件時就產生了奴役」,奴役的目的就是對公民的征服,其結果是服從;這種機器奴役「與其說是『自覺的』,毋寧說是『強迫的』」<sup>18</sup>。

#### 四、創傷的拷問與情動的操演

弗萊明在戰爭中經常會感受到一種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於死亡的恐懼和未來的未知危險。弗萊明在戰爭中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威脅此時此刻來說就是逼近的現實,這種現實是情動的真實。德勒茲思想中的情動(affect)不是情感或者感覺,而是對「存在之力或者行動之能力的連續流變」<sup>19</sup>,是指身體進行感應和被感應的能力,或指身體之行動,參與和銜接能力的增強和減弱<sup>20</sup>。因此,情動是身體的能動性和事件性的建構。弗萊明在戰爭中受到的創傷是身心所承受的傷痛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是施動之力和承受之力相互影響、循環往復的過程,也是不同的機械組裝產生的效果,是一種不斷流變的過程。情動作為存在之力,連接著情感和身體。弗萊明目睹了炮火的摧毀力量、戰士的死亡和戰爭的殘酷,總處於死亡的恐懼之中,恐懼使他變成一個創傷的主體,時刻籠罩在這種持續迴圈的情動事實之中。在小說的描述中,弗萊明經常能感受到這種恐懼所帶來的創傷。「一轉身面對戰場,恐懼便無限擴大」<sup>21</sup>。創傷「是壹種埋藏在內心墳場而未消解的創傷的再現」<sup>22</sup>。戰爭的喧囂使他駭然、使他驚呆。最終在恐懼威脅之下,弗萊明最終「成功」逃離戰爭的牢籠。

慌忙逃走以後,他還是感覺到這種恐懼和威脅。他看到「有個死人正盯著他看……兩眼瞪著青年,活像一對死魚眼」<sup>23</sup>。「那駭人的景象追著他,趕著他——黑色的螞蟻貪婪地聚集在那張灰不溜秋的脸上,膽敢可怕地爬上那雙眼睛。片刻後,他停下腳步,上氣不接下氣。側耳傾聽,想象著什麼陌生的聲音會從死者的喉嚨中發出,粗聲嘎氣地在背後威脅恐嚇」<sup>24</sup>。在出逃之後的荒野中,他也「以為空地是陳屍所,一動不敢動,深恐這些屍體會跳起來嚎哭怪叫」<sup>25</sup>。這種通過感覺、聽覺和視覺所感受到的恐懼一直環繞著他,不斷操演著創傷。創傷成為弗萊明的身體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可以說這種創傷性的身體是一種被構成的機器裝配,它承載著一種視覺,一種德勒茲概念中的「機器的視覺」(Machinic Vision)。弗萊明的眼睛就像是攝像鏡頭,承載了感覺、聲音、圖像和記憶,因此通過接收資訊,視覺被重新編碼,反過來,弗萊明也被機器編碼和觀看,因此發生了與機器關聯的生成<sup>26</sup>,因而弗萊明的眼睛實現瞭解轄域化——一種情動下的生成——投射著攝像鏡頭之下的一切景觀:「黑壓壓激奮的部隊」、「血跡斑斑的士兵」、「火紅渾圓的炮彈」、「源源流出的死屍」……。這些機器視覺下的景觀給主體帶來揮之不去的創傷;他在炮聲隆隆的戰場中戰慄,在激烈的兩軍對戰中退縮。「青年覺得「敵人」是一群可怕惡龍的猛撲,……他嚇得魂飛魄散,閉上了眼睛,靜等被惡龍一口吃掉」<sup>27</sup>。這種對意象的觀看和吸收構成了機器視覺的普遍形式,在弗萊明的身體和思想中不斷循環往復,創傷也因此不斷地被強化和操演。在臨陣逃脫之後,逃兵的愧疚和羞恥感不停地噬咬著、拷問著他的靈魂,譴責的幽靈如同鬼魅隨行,「剎那間他面紅耳赤,靈魂之光搖曳著羞恥」<sup>28</sup>。創傷性事件也因此通過意向、情動和操演,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滲透於身體之中<sup>29</sup>。弗萊明身體所感受到的和心中所想像的威脅,通過視覺聯動操演成創傷,持續地反復地影響著他。

創傷的身體如同千瘡百孔的靈魂,一如既往扮演著機器零件的角色,承擔著國家機器賦予的政治使命。戰士們傷痕累累的身體印證著戰士的勇敢和犧牲,代表著榮譽和勳章,讓弗萊明羨慕和嫉妒。尤其是「凝視未知世界」的兵魂,在生命燃盡的時刻,仍然大踏步走向戰場,「舉止間分明透著股莊嚴儀式的意味,而且頗像一位獻祭者,祭祀一種嗜血噬肉碎骨頭的瘋狂宗教」<sup>30</sup>。士兵們具有的這種騎士精神和犧牲精神正是國家機器對戰士規訓的結果。因此,受傷的士兵,無論是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還是身體創傷,都是一種情動力下的機器組裝,依然進行著資本網路和權力規訓的構建,因此仍然是一種能動的事件性生產。戰爭使得

世界變成一座「空空蕩蕩的大舞臺」,所有人都是表演者,無人能夠逃脫。

## 五、英雄的祛魅與戰爭機器的生成

作為戰爭機器的弗萊明,在逃跑之後繼續與國家機器抗爭,最終失敗回到戰場。戰爭創傷、恐懼和羞恥感,生成真正的機器組裝,雖然看似實現了個人心理的成熟,實現了戰鬥「英雄」的理想,但事實上仍被國家機器所捕獲,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鏈條中的零件。

弗萊明回歸戰場之後的生存與他之前的逃跑是分不開的。弗萊明從戰場上的「出逃」也是小說中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他每一次的地點位移都可以說是一次「逃逸」(flight)。弗萊明深受戰爭神話的鼓動,從家園來到戰場,這是一種轄域化的過程。軍隊具有一種編碼,而這種「編碼—轄域的背後都有整個國家機制的超編碼(surcode)系統作為保證」,而「種種預定的編碼、超編碼則成為一堵堵我們無法穿越的意指之牆,把我們囚禁在大大小小的鐵屋之中,釘死在這些牆上」<sup>③</sup>。弗萊明在軍隊中被編碼、被裝配,自身能力被組織、重組和強化。因此軍隊如同宗教一樣,「是以群居的轄域的方式來運作」<sup>④</sup>。

在戰場上,弗萊明被戰爭這個巨大的食人機器所震撼,每個人都像動物一樣撲進戰爭的機器中去,又像廢棄的子彈殼一樣被連綿不斷地彈出來,戰爭就像一台生產機器,不斷生產著傷兵和死屍,不斷重複著創傷和死亡。戰爭就是「血腥的畜生,嗜血的妖精」<sup>⑤</sup>。在戰爭中,弗萊明感覺每個人(包括他自己)都生成了動物,更確切地說是妖魔。戰場打著政治的烙印,承載著國家機器的理想和目標,因此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條紋化的空間。面對殘酷血腥的戰爭場面,雖然弗萊明被嚇得目瞪口呆,但舉槍的一刻,他就能不由自主地擺弄著武器。因此,弗萊明在條紋空間中完成了一次解轄域化,生成了一種失去人性的東西,一種弗萊明所說的殘暴的動物——「野獸」、「惡狗」、「兀鷹」。「生成動物並不是像某種動物一樣或者是某種動物,並不完全離開人類領域;這是一種 becoming-animal 而不是 being animal……『這』是一種『橫截線』,既連結又超越人與獸的視閾。……『這』是人與動物的互為解轄域化,是處於一種流變之間的連結」<sup>⑥</sup>。在戰場這個轄域化的條紋空間中,同時發生著解轄域化的生成。它通過對動物產生情動,達到人與動物的臨界點,通過情感的解轄域化對身體產生作用,從而實現這種非主流化的生成。弗萊明在軍隊和戰場中被編碼和重組是被轄域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自身的解轄域化的過程,解轄域化的同時也會釋放出新的「逃逸線」,兩者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都「強調既定轄域或束縛的努力,旨在於創造新的流變、生成的可能性。解轄域化或向自由逃逸之後,往往伴隨著某種重構或再轄域化」<sup>⑦</sup>。

弗萊明出於對死亡的恐懼,也出於對戰爭本質的清醒認識,不斷萌生出退縮和出逃的想法,最終在一次戰鬥中做了逃兵,成功擺脫了既定轄域和束縛,逃離到荒野,遠離了「死神的聒噪」,游離在大自然之中,成為「遊牧民」。德勒茲認為:「遊牧民的根本的規定性,就是佔據或掌握一個平滑空間:正是這個方面將其界定為遊牧民」<sup>⑧</sup>。但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遊牧民不是單純地指四處遷徙漂流的草原牧民,而是指打破國家機器的捕獲,抵制和解構「權力編碼」的主體。在遊牧于荒野之初,他有種自由的舒適感,大自然的景色令他寬心,如畫的田野擁有生命,「他認為自然是位女性,深深厭惡悲劇」<sup>⑨</sup>。弗萊明與自然產生情動,在自然中找到慰藉,又一次進行了「解轄域化」的運動,生成了女性化的大自然。他從獨裁的條紋空間中逃離出來,進入一個自由的王國。齊格蒙哥·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一個人或許能夠逃脫成為一個犧牲品,但仍然逃脫不了作為一個附帶傷亡的命運」<sup>⑩</sup>。在戰爭中,大自然也被侵佔,四處遍佈著死屍和殘骸;於是,大自然這種平滑空間也不可避免地被侵蝕。好景不長,「自由人」弗萊明被發現或者說是被「捕獲」,被重新送入戰場中去。

回歸戰場之後的弗萊明掩蓋了逃跑的真相,但內心的恐懼和羞愧吞噬著他的靈魂。他迫切渴望用真正



的豐功偉績來消除這種愧疚感，來證明紅色「勳章」（頭上的創傷）的合法性。在戰勝了內心的恐懼之後，他拋棄了內心的羞恥感和人性，變成和逝去的兵魂一樣「英勇」的戰爭機器，機械地投入戰鬥中去。「他不停地往裡壓著子彈」<sup>⑨</sup>，和其他戰士一樣，沉浸於火熱的戰鬥之中，奮力來回運作。在危機四伏、子彈肆虐的戰場上，他高舉著軍旗沖在最前面，激情豪壯，儘管他並不情願與戰友爭搶這面旗幟，而且內心希望對方能承擔這份最危險的任務，但是他仍然「表現出崇高的義無反顧」，他感到一種「野蠻宗教狂的勇敢，願意做出最大的犧牲，驚人地死去」<sup>⑩</sup>。最終，他實現了「英雄」的壯舉，在戰火停歇之後仍然忘我地射擊，戰鬥成為弗萊明一個人的表演。而和古希臘創造秩序的英雄和騎士不同，「英雄」弗萊明卻受秩序支配和規訓，臣服於工業化的秩序和機械化的國家機器。正如德勒茲所言，遊牧的生成是艱難而又不確定的<sup>⑪</sup>，因此弗萊明最終難以逃離轄域化的生產關係。他不再是一個人，而是被物化為一個自動武器和殺人機器，成為資產階級生產線控制和規訓之下的一個機械符號；弗萊明也因此完成和實現了再轄域化的過程，重新回到條紋空間，生成了戰爭機器，成為資產階級社會國家機器的組裝零件。

總之，戰場是一個服從規訓同時也是抵制統治的場所。通過塊莖化解構，戰場成為一個可控的條紋空間，逃跑的弗萊明企圖逃離或打破這種條紋空間，逃向自由的平滑空間，在被遣返回戰場後，弗萊明又重新回到條紋空間，戰勝了內心的恐懼，生成殘暴的動物，在機械戰爭的不斷規訓和強化之下，他摒棄了懦弱和羞恥，最終生成了戰爭機器。弗萊明的不斷逃逸，是一種轄域化、解轄域化、再轄域化的過程——是一種內在的生產、機器的生產和組裝的生產。這種無限的生成就是事件<sup>⑫</sup>，因為「事件是生成的強化和連續的結果」<sup>⑬</sup>。這種生命的不斷地解轄域化過程就是一種事件性的生產。

## 六、結語

斯蒂芬·克萊恩在《紅色英勇勳章》中對於戰爭的描寫是對「荷馬傳奇」式英雄主義的顛覆和祛魅。戰爭的殘酷，人類的懦弱在小說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媒體、文學作品和勳章等文化符號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表現形式，是欲望的編碼和權力的轄域化，具有造魅的力量，給戰爭蒙上了浪漫和傳奇的面紗。作者通過弗萊明的所見所感展現了戰爭機器的規訓、奴役和欺騙本質；戰爭操縱的士兵的命運，其實是國家機器的工具、政治的繼續。戰爭的血腥和殘暴使得弗萊明驚慌失措、臨陣逃脫，在身心遭受創傷之下，弗萊明總是處於死亡的恐懼中，這種情動事實持續不斷製造著創傷。為了逃脫被操縱的命運，弗萊明由戰場出逃至荒野，後被再次送回戰場；弗萊明由家園到戰場、由荒野到戰場的過程，是一種「轄域化」、「解轄域化」、「再轄域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弗萊明不斷進行了生成，他在戰場中生成了瘋狂的「野獸」，成為了戰爭工具和國家機器的組裝零件。這種不斷變化的能動性的生成是一種生命事件，是對戰爭規訓權力的質疑和抵抗，也反映出克萊恩對傳統「荷馬傳奇」式的戰爭思想的顛覆和祛魅。

### 注釋

①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3).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Hurley, R., Seem, M. & Lane, H. 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②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Massumi, B.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③ Kaplan, A. (2007). The spectacle of war in crane's revision of history. In Bloom, H. (ed). *Stephen Crane: Bloom's classic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④ Sorrentino, P. (2014). *Stephen Crane — A life of fir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⑤⑦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Crane, S. (2009).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的漢語引文參考了斯蒂芬·克萊恩,黃健人(譯):《紅色英勇勳章》,桂林:灕江出版社2012年版,頁4-146。
- ⑥ 周娜:《帝國軍官之死——從〈好兵〉透視福特對於大英帝國衰落的憂思》,《英語研究》,2014年第4期,頁30-35。
- ⑧⑮㉔ Holland, E. W. (2013). *Deleuze & Guattari's A Thousand Plateaus: A reader's guide*. London, New Delhi, New York, Sydney: Bloomsbury Academic.
- ⑨ LIU Shixian. (2023). Transnational Trauma and politics in Phil Klay's post-9/11 war novel *Redeploym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 029-038.
- ⑩ 吉爾·德勒茲:《遊牧藝術:空間》,載汪民安(主編):《生產:德勒茲機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頁159。
- ⑰ 吉爾·德勒茲:《德勒茲在萬塞訥的斯賓諾莎課程(1978-1981)記錄》,載汪民安(主編):《生產:德勒茲與情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頁6。
- ⑳ 蔣棟元,朱哲:《〈另壹個世界〉:代際間幽靈創傷視閥下的戰爭記憶》,《外國語文》,2019年第3期,頁47-52。
- ㉒ Johnston, J. (1999). Machinic Vision. *Critical Inquiry*, 26 (1), 27-48.
- ㉔ Clough, P. T. & Halley, J. (eds). (2007). *The affective Turn—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㉕ 朱立元,胡新宇:《線與生成:德勒茲文學創作理論的兩個主要概念》,《文藝研究》2012年第2期,頁20-29。
- ㉖㉗ 麥永雄:《德勒茲與當代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78-83。
- ㉘ Bauman, Z. (2004).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London: Polity.
- ㉙ Badiou, A. (2009). *Logic of the worlds: Being and event II*. trans. Toscano, A. New York: Continuum.

(Editors: Joe ZHANG & JIANG Qing)